

THE PRICE OF EMPIRE



〔美〕威廉·富布赖特 著

帝国的代价

帝国的代价

[美] 威廉·富布赖特 著

简新芽 龚乃绪 李松林 译
朱士清 高雨洁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035111

William Fulbright

THE PRICE OF EMPIRE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39

根据美国潘雄图书公司198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吴力超

封面设计：王麟生

帝国的代价

[美] 威廉·富布赖特 著

简新芽 龚乃绪 李松林 译

朱士清 高雨洁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5 字数：139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012-0350-4/D·58 定价 2.80元

出版说明

威廉·富布赖特是美国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从政，当了30多年的国会议员，并且是1959—1974年间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本书是他最近完成的政论著作，集中论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兼及美国政治制度和军事化经济。富布赖特自称是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自然不否定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也并无同情。但是他从维护美国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批评“炫耀武力”、干涉他国事务的全球争霸政策，许多论点和论据是有意思的。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他也着力揭露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弊病，并且嘲讽总统选举是“浅薄电视滑稽剧”。作为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美国政策和制度的一种批评，本书是有其参考价值的。至于富布赖特的基本价值观与我们不同，他的具体政策主张也并非我们都能同意，这些都是毋庸赘言的。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冷战：美国与苏联	5
第二章 我们在宪法和政治上的死胡同	34
第三章 回顾越南战争	79
第四章 我们的军事化经济	100
第五章 干涉	116
第六章 中东	133
第七章 像别人一样来看待世界	142
后 记 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164

序 言

人们要是记得我，我想那是因为我是持不同政见者。虽然持不同政见并非我的初衷，但是当重大问题违背了你最崇高的愿望和最坚强的信念时，你别无他择，只能表示异议，要不就撒手不管。

我并非执意要持不同政见，只是觉得，参议员有责任坚持其独立见解，而不单是唱反调。1965年我在参议院作了一次演讲，我批评了约翰逊政府对多米尼加的干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之后，试图按本人的理解来阐明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分。我当时说，主席“负有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出谋献策的特殊职责。我认为这是主席一职固有的责任，比效忠党派更重要；这一职责与行政部门的人是否要征求主席的意见毫不相干。”

回顾一下，我记得行政部门很少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我想，平时恐怕都没有想要征求我的意见。然而，不管行政部门想不想要征求，我还是照样给他们出主意。我的所作所为有无永久性价值，任凭他人评说。回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70年代中期这段从政生涯，可以说有不少值得一提的积极倡议，诸如：历时已达42年之久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以联合国形式复苏国际联盟——我认为我对此做出过微薄的贡献；以及肯尼迪中心的创立。但是有时，似乎需要加以回想一番，事情就显得明白了：我希望的较多，现实中不可能都能实现。越南战争以及改变权力分立原则和总统选举程序的任何设想所遇到的阻力，使我受到挫折。早期拉丁美洲政治家米兰达毕生献身于自由和独立，但结局未有定论。我像他一样时时感到惆怅：在这些领域里，我“耕耘

大海”，徒劳无功。

但是，我不懊悔。因为似非而是的政见在易于取得成果的政治活动中是较少见的，但它们却是真正值得求索的。这样说并非要诋毁大坝和河流项目，也不是要贬低每个官员都支持和提倡的都市美化和扶农计划。我欣然为阿肯色州的棉花、养鸡、大豆、大米及其他地方工业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项目给我家乡的人民带来了一点繁荣。这些国内计划多少属于易于取得成果的范畴。它们造福于民众，因此备受青睐、值得推崇，但是它们解决不了更大的问题，诸如：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治理我们国家的方略及挥洒自如地驾驭20世纪末期的形势和挑战；有次序有重点地解决安全、经济、教育以及社会公正等国计民生问题；像别人一样来看待世界，以及朝着全球合作对付全球挑战这一永难捕捉的目标前进。

这些都可以称作“生存”问题。谈到这些问题总是碰到重重阻力：顽固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短视，呆滞的想象力，共同的贪婪和政治野心，机会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在代用词“现实主义”的名义下，一些方案，如：结束使经济衰弱的军备竞赛，合理地重新审议我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挑选总统的程序），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尚未兑现的联合国承诺等方案，时常遭到奚落和嘲弄而被搁置。一些用语也有所改变——一改“对共产主义软弱”为“憨傻”、“天真”乃至“反美”。甚至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自由”一词，在最近的竞选运动中也变成了一个辱骂的词；两位总统候选人都避讳这个词，唯恐被人看作家庭守护神的亵渎者，宝贵的古老神话中的持异议者，或是我们惯说的那种和平的滋扰者，或是古老真理（过去曾是而现在不是真理）的挑战者。当我想到这些事时（我尽量不去多想），我就会想起一位瑞典伯爵在欧洲蒙受了百年战争的浩劫后对他儿子所说的话：“记住，孩子，管理这个世界的智能是何等的低下。”或者，我会想起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

中所作的一句评论：“我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缺乏独立思维和真正的讨论自由。”

这是问题的底面，是现实而令人绝望的一面；倘若只有这一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毫无办法，只好坐等毁灭了。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有另一面——我们人性的度量，不论其多么脆弱，它却养育着理性和同情。毋庸置疑，我们很少吸取经验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不吸取经验。每隔一段较长时间，世上必有新奇事物——从培里克里斯的古雅典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从古罗马的和平到我们现时所处的法治时代里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世界和平大构想。这些都是值得争取的目标。如果往昔表明仅有一线成功的希望，那么在一线希望与根本无望之间毕竟是不同的，存在着一个有希望的世界。

事实是，我们也许是处在有前途、有希望的历史关头。不少地区性冲突，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两伊战争，正接近收场或处于停火状态。在美国一个新政府已经上台。虽然新政府还需要考验，但是新领导人的就任至少激起思维新方式的希望。也许给我们指望最大的实情是：不仅中国，俄国也有明智的、富有革新精神的新领导，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态势，使我们有可能化解超级大国间的相互毁灭性的仇恨；遏制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扩散；重新疏通所获得的资源渠道，以提高我们全球所有社会的生活质量；建立起和平解决地区性冲突的更有效的机制；以及有可能建立起亟需的全球管理制度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岌岌可危的全球环境。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美国可能重蹈历史上如此众多强国的覆辙——走的是强权政治并与另一强国昏然争霸的道路，一条古雅典走过的老路，一条过去一世纪欧洲诸帝国此兴彼衰的老路。我们的“人间天国”的伟大诺言，一度掷地有声，已成为武力炫耀的押宝并最终成为武力炫耀的祭品。

但是决无美国命中注定要衰落和垮台之说。如果万一美国要衰败，那也是我们缺乏创造性想象所致。因为当全部理性和常识

指导我们依照最良好的愿望和真实可靠的契机行事时，我们却仍然受古老神话的束缚而畏缩不前。最有害的神话是笃信权力分立原则，尤其是总统选举程序，神圣不可侵犯。现行做法破坏着民主政府的实力和信誉，并且正在损害美国。

我们的前途不在地球上，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决心。富于创造性的领导及开明的教育，事实上二者不可或缺，是人类光明前途的第一需要。培育这些——领导能力，学识及文化间的移情作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际奖学金计划的宗旨。40多年前，我十分荣幸地在美国参议院发起这一计划提案。这是一项朴实无华却目标远大的计划：在一国的国际事务中可以比以往无效的强权体制取得更文明、更合理和更人道的成就。开始提出这项计划时我就相信这一前景。现在我仍然如此相信。

第一章

冷战：美国与苏联

里根—戈尔巴乔夫四次最高级会谈之后，我们仍要努力制订对付这个超级大国的可行政策。当此之时，我不怀疑，我们的决策只是部分地依据某些特殊问题的事实与利害，如中东问题，军备竞赛问题和人权问题。我们决策的形成至少同样（而我认为更多地）基于双方的态度，即我们和俄国人所持的不断相互影响的态度。如果各方一如既往依旧基本确信另一方的真实目标是称霸或毁灭，那就根本无法达成全面军备控制协议，因为几乎任何一种武器系统都具潜在的攻击性；那就根本不会为中东和平进行合作，因为任何施加影响的尝试都可能被理解为全球阴谋的一部分；那就不会有贸易的持续增长，因为几乎每一种商品，甚至粮食，都可增强一国的备战能力；并且也肯定不会在人权问题上有长期性的改善，因为从苏联立场上讲，放松控制就会向西方颠覆打开大门。

我觉得非常古怪和迷惑不解的是：我们竟然对俄国人如此着魔。我过去常想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不认为我们对俄国人怀有像曾对中国人的那种深刻的厌恶和猜疑。的确，一旦我们弄清了中共领袖们像我们一样惧怕和敌视苏联人时，我们像拥抱事实上的战略同盟者一样，欣然拥抱中国，虽然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人也是共产党人，而我们同他们相处得很好；而且我们甚至对罗马尼亚人也足够友好的。现在在我看来很明显，我们忧心忡忡、耿耿于怀的正是俄国。俄国人某

些方面使我们非常敏感——他们幅员辽阔，实力强大，有资格在全球称雄争霸。在这方面，我们和他们一样，而这种相似刺激着我们，使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很快成了竞争对手，那是十分自然的事。自雅典和斯巴达以来，竞争一直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古老赌博，它固然是一种残忍而又致命的游戏，然而毕竟不过是场赌博而已。尽管意识形态各异，战争仍然是统治者的赌博。可是核武器，甚至常规武器的威慑已改变了这一切。这是我们在核时代进行的一场新的赌博，一场非理性、非人道、自灭性的赌博，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赌博；而只有拒绝进行这场赌博，我们方能避免赌输。

我们似乎深切地感到，而且有时也说，我们必须当头号，更确切地说，必须被人认为我们美国比苏联更强大。说到底，这个问题意义之重大犹如谁是足球场上的冠军。我们已把全球政治变成了一场橄榄球赛，犹如一场内布拉斯加与俄克拉何马两州争夺冠军的较量。那是内布拉斯加与俄克拉何马两州的大事，或是华盛顿·雷德斯金与丹佛·布龙科斯两个球队的大事。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伤害任何人，而使大家很高兴。即使当初法国尔后德国争夺欧洲霸主地位时所造成的损失也不是全球性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竞赛再也不能视为儿戏了。

我认识到，把我们同苏联人的竞赛说成是一场“赌博”，一场毫无道义内容或价值的争夺，这会冒犯许多人，同时也会引起某种程度的误解。这不是我要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才是真实的重要的问题，同超级大国竞争的战略赌注和经济赌注一样真实和重要。但是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也未必是载入历史的基本问题。出奇制胜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但不是强国竞争的全部内容，它似乎是永远存在的要素，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虽未得到公认，但一向存在。

有人说，俄国人只崇尚实力。我不十分明白“只崇尚实力”

这个说法的意思。我不是在提倡我们单方面裁军，我们大家也不是这样。这是不成问题的。渴望拥有胜于任何人（其中包括俄国人）的最强大的摧毁能力，还是满足于与他人平起平坐，这二者差异颇大；有了核武器之后，这种差异尤为明显。这从语义上理解有些困难，但是，我看不出军备竞赛（包括建造更大更好的核武库）会增加我们的安全。相反，正如1988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看来为时已晚地承认：军备竞赛，尤其是每项武器技术上的新进步，已从指数上减少了我们的安全。

俄国人的威胁当然存在，但是，随着手中握有核武器，我们关于全球政治的整个思维早就该改变。1945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突破。欧洲迄今仍是世界权力和文化之中心，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是一片废墟，气息奄奄，它的杰出地位丧失了；当时看来，显然复原无望。苏联遭受了2000多万人口的损失。中国在外入侵和内战中也蒙受了同样的损失；德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城市被夷为平地。而这一切大都是发生在日本两个城市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前。核武器的出现本该会充分地说明（如果原来不清楚的话），大国间的战争已是自杀性战争，对文明国家的人民来说，是非理性的因而是不能容忍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灾难，过去并无和平与世界秩序的模式可仿，确也无任何经过考验的、能确保文明和人类生存的制度可循。1945年，爱因斯坦说过：“现在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外，一切都变了。因此，我们正在向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漂移。假如人类要生存下去，我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取得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为此缺憾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我们仍然冥顽不化，拒绝面对我们处境的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拒不正视我们和俄国人是如何继续被民族私利和民族自我扩张的陈旧观念所驱使。听听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的言论，你就会感到，他们满脑袋除了这些成见之外并

无新的东西。他们都声称（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怀有最崇高的理想。谁也比不上演说者本人更能被一篇动人的演说所打动。但只是雄辩并不就是真理。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却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

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类想法，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对付我们人类许多共同的问题。我们美国人特别喜好说明自己是 有道德的。我们不断地强调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纯洁的，于是便轻易断定，凡是怀疑这些动机的人必定是道德堕落者。吉米·卡特的“同人民一样好的政府”的说教及里根的“邪恶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这并不是要表明，我们过去四五十年中提出的反共责难没有实质内容。像苏联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一直是残暴和专制的，至少到最近是如此。苏联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东欧，同样残忍、粗暴，虽然近几年有所收敛。但是苏联的制度及其对外政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抵制和反对许多暴行的，从而显示了那种制度并非就是“现代世界的祸害之源”，更不是庞大的全球阴谋的策源地。

我把个人道德准则应用于国家行为时总会遇到种种困难，现在仍然如此。国家道德规范不同于我们所希冀的个人道德规范，也就未必那么严格。虽然美国在这方面也许有比某些国家较体面的历史记载，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同其他那些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冷战政论家宣扬什么我们的道德水准要比其他任何人的道德水准高得多，而我毫不怀疑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然而，我总觉得，这种假装神圣是损人利己的和自欺欺人的沙文主义。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俄国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统治世界的卑鄙阴谋，对这种看法，我极为反感。我想起1965年干预多米尼加时参议院外交委

员会里的一次交锋。我提出，我们的军事干涉同俄国人在东欧的作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一位共和党同仁对我的论点提出异议，我追问他差异何在，他最终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我从政以来，一直碰到这种事情——总感到自己优越，而我却总是觉得这种优越感是对别国人民的一种轻蔑。我们的国家的确不错，在许多方面都很了不起，但是，我从不认为美国人在道德上也优于别国人民。只要看看我们的所作所为便一目了然。我们的行为同我们自视很高的估价大相径庭，比如，很难说我们在越南的行为同俄国人在阿富汗的行为有多大差别。

尽管有周期性解冻、军备协议以及朝着缓和迈进，我还是认为，在美国，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俄国人不讲道理；正如迪安·艾奇逊说过，不可能同他们做生意；毫无疑问，他们一心要摧毁我们，统治世界。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办法。我们对俄国人有着一一种心理上居高临下的态度，仿佛他们不是人类中的真正成员。这种态度我们不必去深究，反正我们实际上很难把他们看作人类中值得尊重的成员。我想俄国人不会不注意到这种态度；这种态度肯定令他们十分不快。不是在我们日常的接触中，也不是在我们的正式外交交往中，而是在我们的根本态度上，存在着一种假设：无论他们在干什么事，都是为了某种阴险的目的。我想，他们对我们恐怕也有同样的印象和看法。

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56年写道：

就看待外国而言，缺少客观性是人人皆知的。长期以来，一国总是把自己说得尽善尽美，而把别国说成十足的腐败和残忍。评判敌人的一举一动用一个标准，而评价自己的一言一行则用另一个标准。甚至敌人的善行也被视为穷凶极恶的征兆，意在欺骗我们和全世界，而我们的丑行则是必要的，是为我们的崇高目标服务的，因而也是正当的。的确，如果像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来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性是

极为少见的，而不同程度的自我陶醉的歪曲，则是司空见惯的。

我有个感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俄国人找碴寻衅。这个想法在美国说出来是很不得人心的，而且我敢肯定参众两院也决不会承认。其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挑衅，是因为我们从不想让他们相信，我们承认他们政体的合法性，或者是，我们愿意在国际社会中把他们视作政治上平起平坐的对手。我们居高临下的态度及我们道义上的种种责难，促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他们的政体；我们要他们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民主社会，然后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如果他们不拥有像我们一样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就是非法的。

说服他们相信，我们并非一定要推翻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他们可以从事一项困难而有意思的社会实验；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说，“我们怀疑你们的制度卓有成效，但是如果偶然你们的制度比我们的运转还灵，那好，上帝保佑。只要你们不打扰我们，不想颠覆我们，我们也不会颠覆你们。”我建议我国新领导人采取这种态度。我还向他们建议，要说话得体，表明这种态度，并且言行一致。

当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1959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讲演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核心乃是合法性。国务院曾要我给他安排点什么，因为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像拒绝给宗教罪人圣礼的牧师一样拒绝让赫鲁晓夫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讲。戈尔巴乔夫1987年也碰到类似情况。有些“保守派”的人就是不愿让共产党人对他们演讲，也许是因为害怕这种场面污秽不堪，其邪恶可能会传染开来。这当然荒谬可笑。尤其是当你看到以往向两院联席会议作过演讲的人，更是如此，其中一些人的道德品质经不起仔细的调查。

不管怎么样，赫鲁晓夫还是来到了外交委员会。他兴致勃勃

地讲了话，而且事实上他的讲话相当和解。尽管赫鲁晓夫素负咆哮恫吓的声名，但在我看来，他并不十分可怕。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并没有一心在盘算（更不是阴谋策划）摧毁美国，也没有在筹划精心贯彻马克思教义的赌博计划。他所陈述的中心大意是，苏美未来关系取决于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社会早已出现在国际社会。据我所闻，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是拥有合法存在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并不要求我们赞许，只是要我们承认这一事实。他说，“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我们就能够相处并正视其他问题。

谚语说：邪恶或许就在闻者的耳朵里。赫鲁晓夫说：“我们要埋葬你们。”美国人听到这话认为是军事挑衅，是核战争威胁，而且大为光火。这句话肯定是挑衅性的，或者至少是吹牛。但是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期间，他有点生气地说，他谈论的一直是经济竞赛。他说，“我对这些对我的思想有意识的歪曲深感忧虑。我从未提到任何火箭。”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何以那么肯定赫鲁晓夫是在进行军事毁灭的恫吓，而不是在谈论和平竞赛呢？既然我们对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为何受到竞赛的挑战就感到惊恐呢？

我认为，我们时常怀有一种优越感的复杂心理：按照里根总统十分喜欢引用的约翰·温思罗普的话来说，美国是“人间天国”，是人类的灯塔。如格拉德斯通谈及美国宪法时所说，我们是由这项最伟大的文件所创造的。美国宪法乃是人类智慧和意志的产物。我们体现了人类不言而喻的真理。这用浅显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优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优于胆敢向我们挑战的那些俄国人。

同时，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似乎患上了一种害怕他们竞争的恐惧症。对共产主义和俄国最富感情色彩的种种攻击，在我国政治语汇中是司空见惯的，这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制度能否有效地、和平地同俄国人竞争缺乏信心；尤其表明我们若不使用极端的言

词来调动人民，我们就更无信心同俄国人竞争。倘若这些人真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对美国的制度充满厚爱和深信不疑，那么他们何以如此惧怕？尤其是在大量证据证实我们的制度的确要比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更有成效得多的情况下，竟也如此惧怕？

我们对要强硬、外交事务中要有强硬政策以及我们绝不示弱等谈论很多。尼克松总统就是一位喋喋不休表白自己如何强硬的总统。甚至他在同苏联同行搞明智的缓和时也是如此。而尼克松的继任者们无一不心领神会，受到启发。他们这样做的前提似乎是，和解会很快把我们诱导到引起侵略的绥靖上去——这是过分吸取了慕尼黑教训。事实上，一位真正坚强而自信的领导者不会到处鼓吹其美德和“强硬”的。如果他具备这些素质，那么在他所采取的行动及奉行的政策中可能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他缺乏这些素质，说得再多再好听也无济于事。关键问题依然是：那些主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反对一切妥协、惯于使用激烈语言的极端理论家们，是否真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充满信心。种种事实表明他们害怕在和平基础上的竞争；而且为了阻止我们两种制度在和平条件下的公平较量，他们企图先发制人，让苏联卷入一场军备竞赛，使他们先于我们垮掉。我们打算使他们过度开销军费，迫使他们耗尽资源，从而使他们既无资力坚持军备竞赛，又无资力改善他们自己的社会条件，于是我们就能如愿取胜。我们确比他们有钱，而且迄今我们至少在技术上占有优势。问题在于，迫使苏联人走向破产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被军备竞赛拖得筋疲力尽。我们的冷战思想家们交付给我们的游戏是场输家的赌博——至少参赌者是输家。而现在和未来的赢家是那些利用自己的资源使自己的社会运转的欧洲和亚洲的旁观者。

俄国人究竟何许人也？我们能否设想，他们与我们虽有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差异，但共有普通的人性？他们的动机是否可能像